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ShiJi Yu ZhongGuo ShiXue

《史记》与中国史学

杨燕起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Shi Ji Yu ZhongGuo ShiXue

《史记》与中国史学

杨燕起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与中国史学/ 杨燕起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9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8427-9

I. ①史…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②《史记》—研究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8657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9.00 元

策划编辑: 刘松毅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编辑: 赵雯婧 曹欣欣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郑师渠 晁福林

主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帆 易宁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冠英 宁欣 汝企和

张皓 张越 张荣强 张建华 郑林

侯树栋 耿向东 梅雪芹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特别是崭露头角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作品，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集中展示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也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后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特别是以中青年学者作品为主的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4年3月

目 录

导 论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3
---------------------	---

上 篇

第一章 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	41
第二章 《史记》的体例与“通变”	54
第三章 《史记》与中国史学的自觉	67
第四章 《史记》和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80
第五章 《史记》所表现的社会结构及人的主体性思想	92
第六章 司马迁与董仲舒	104
第七章 《汉书》与《史记》	120
第八章 形同《史记》“太史公曰”的《汉书》之“赞”	139
第九章 《史记》与《书教下》	155
第十章 《史记》与《史学述林》	170

中 编

第一章	本天地之法则建帝王之纲纪	185
第二章	《史记》在经学与史学结合中的地位	206
第三章	《秦始皇本纪》的文献价值	220
第四章	从《史记》之本纪看项羽的历史地位	231
第五章	项羽功绩的历史价值	244
第六章	《项羽本纪》——一篇关于战争评述的纲领性文献	258
第七章	项羽的人格魅力	268
第八章	刘邦在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中的地位——读《史记·高祖本纪》	281
第九章	《孝文本纪》散论	295

下 编

第一章	十六诸侯世家论析	307
第二章	《史记》宣示“孔子智慧”的价值	323
第三章	《史记》所撰孙武之传的历史价值	335
第四章	司马迁的“为百姓言”	345
第五章	汲黯的人格魅力	352
第六章	《史记》所叙汉武之拓边陲	365
第七章	《史记·货殖列传》述评	375
第八章	“盛德之后，必百世祀”	382
后 记		392

导 论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一、司马迁的身世及其所处时代

《史记》被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重要价值，使之成为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备受人们称赞。

《史记》的作者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依王国维说），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即公元前90年或稍后，一生大致与汉武帝的统治相始终。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史学家，生活在汉之文、景、武时期，卒于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享年50余岁。《史记》实际上是司马谈在武帝任命他为太史令时就已开始写作，而最终由司马迁接续完成的，这也开创了我国古代私家著史中父子共同完成一部史书写作的先例。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他们先祖在远古掌管天文观测、从事星占术和在周代开始断断续续地担任史官的业绩感到自豪和骄傲。司马谈在担任太史令以后，以继承和发扬先祖的光荣传统为己任，开始实施写史的计划。司马谈在《史记》写作过程中的贡献，可以简略概述为三方面：第一，他撰著了《论六家要旨》，对春秋末期孔子创设儒学以后所出现的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局面做出了总结，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将诸种学术论定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分别概括出各家的学术特征，在奠定此后我国学术研究和分类的基础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史记》写作提供了明确的学术认识的指导原则；第二，他奋然以当代周公、孔子自命，立志继《春秋》以兴盛“天下之史文”，并已经开始对历史进行了相关的考察研究，同时积累了各方面的资料和考虑了初步的体例设计，且具体撰

著了某些篇卷；第三，为了培养写史的继承人，司马谈创造条件对司马迁进行了有益的培养和教育，关于这方面，司马迁后来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到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朝廷大小官员以能随从皇帝参加这样的大典为无上光荣。行进到洛阳附近的时候，司马谈因重病不能前进了，他感到特别悲伤，恰好在这时，奉命出使西南的司马迁回来要向皇帝报告任务完成的情况，见到了病危中的司马谈，司马谈叮嘱司马迁牢记“孝”德来完成自己未竟的写史事业。由此，司马迁接受了遗命，表示坚决遵从，不敢疏忽。随即司马谈带着痛苦和遗憾离开了人世。司马迁从小生活在民间，在龙山以南和黄河北岸的地区体验了耕种和放牧的农家风情。在父亲有意识的培养教育下，十岁就开始学习《尚书》《左传》《国语》《世本》一类的古文典籍，随后跟着父亲到达长安，聆听过孔安国讲《古文尚书》、董仲舒讲《公羊春秋》，这些经历都为他后来学术上的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十岁开始，司马迁在父亲的安排下，可能以“宦学”的身份周游全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三十岁前后，汉武帝任命他做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些经历，加上司马迁后来出任太史令和中书令，随从武帝出巡的经历，使他一生的足迹，除了未及相当于今日长城以北和两广的地区外，达到了汉代当时版图陇山以东的整个范围。这对于他接触并了解各地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以及下层民众的痛苦等都有极大的好处，从而也增强了他对世事的观察辨析能力，为他后来的写史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司马迁的一生，有两件事对他影响最大。第一件是司马谈辞世时的遗嘱。司马谈临终对他讲述了家世的光荣历史，更表述了自己立志作史的决心。眼看无法完成，司马谈嘱托司马迁千万不能忘记自己“所欲论著”的宏伟事业，并教导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要求司马迁以周公、孔子为榜样，以其“论载”来歌颂“海内一统”的汉家天下。于是，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低下头流着眼泪

表示了决心：“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①这就是说，仅就这一短暂的场景而言，司马迁所承受的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无穷力量及其所要求的坚毅品质，这对他后来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来完成《史记》写作有决定性的作用。第二件是李陵事件。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为“政治上糊涂”，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又因为家境贫寒拿不出钱赎罪，而被判处了宫刑。这对司马迁来说是个莫大的打击。受宫刑就意味着与宦者为伍，这使他感到极度的羞耻，曾经因此产生过自杀念头，但他还是坚毅地活下来了。“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可以看出，还是父亲的遗训帮助他在痛苦中做出了正确选择。不过由于这一亲身遭遇，司马迁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评述态度是更加客观冷静了，已经不完全如司马谈最初设计的那样一味歌颂。他能更清醒地全面认识社会，并站出来对某些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从而使《史记》获得了更强的政治和学术生命力。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去世，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负责观察天象、记载史事和掌管皇家图书的事项，这期间他参加了《太初历》的制订。李陵事件后他担任中书令，其职事相当于皇帝的随从秘书，自此直到离世前他历尽艰辛，利用业余时间全身心地完成了《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写作，给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奉献出了一部光辉巨著，并为史学的建立竖立起一座堪称典范的丰碑。

应该看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所以能相继合力完成《史记》写作，除了他们主观上的顽强奋斗，更是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时代所造就的。

促使《史记》在汉武帝末年完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几个方面。西周以来，中国出现了大一统局面，社会生活内容发展更加丰富了，虽然其后有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但经过秦的武力征伐，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汉

^①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本书所引《史记》文字，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9月版。

家接续这个态势，至武帝时已是空前的开拓繁荣了，这就需要有一部史书来反映这一巨大的时代变化。在政治领域中，经过较长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大一统局面下的社会矛盾有所加剧，并不断显露出来，人们不能不注意探求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政策方法，于是需要有一部能全面总结成败兴坏历史经验的著作来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且，儒学产生后出现的各种政治学术思潮，可以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分析社会现象，提出不同的治理社会的策略和主张。如《论六家要旨》所表明的那样，当时已有非常丰富的思想材料可供凭借，帮助人们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得出恰当的认识上的结论。同时，较长时期较为稳定统一的局面及相关的政策环境，使得汉武帝时期的图书文献资料已经充实到足备历史总结的需要。总之，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代，社会需要及政治、物质、思想上已为一部全面的历史著述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加上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个人天赋和努力，《史记》应运而生。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史记》的博大精深，正是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在史学上的真实体现。

二、《史记》的重大史学成就

《史记》在史学上的重大成就，可以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撰写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

在《史记》出现以前，我国古代只有文告汇编、断代编年、地区国别、谱牒世本之类的史书，《史记》才是第一部通史。这部通史，在时间上记载了自远古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以至汉武时代，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并进入封建社会，总共长达三千年的史事；在内容上记载了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天文、地理以至于医术、占卜等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所以说它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在地域上除主要记述汉武帝时期国家版图中心地区的史事之外，还包括了周边少数民族和域外国家，视野所及为当时已知“天下”的全部社会生活状况，所以它又同时具有某种世界史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这部通史的表述，有着非常明确的划分阶段的特点。依据历史事势的发展，司马迁将三千年的

通史划分为春秋以前、春秋、战国、秦楚之际、汉代五个阶段，并精辟地概述出各阶段的特征，而集中表现司马迁对这些特征认识的是“表”及其序文。代指春秋以前阶段的是《三代世表》，虽然其序文没有关于该阶段的论述文字，但实际内容是强调中国本土上世系的产生与延续，以及随后出现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分封的形成。其他阶段的特征如五霸争雄、七国扰攘、号令三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等，分别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四篇序文中做了明确的论述说明。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说明，显示出司马迁具有极其高明的历史见解。同时，《史记》这部通史撰史所确定的一些原则，也影响了我国古代的史学。首先是通观原则，后代直接标明有“通”史特点的《史通》《文史通义》《通典》《通志》《通考》《资治通鉴》等，直接有着《史记》通史影响的痕迹；其他许多类别的史书，虽然没有直接标明“通”字，但也在不同性质、不同程度上受《史记》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通”识，常常是评论史家史识高低的重要标志。其次是统系原则，《史记》记述统一、强调统一、歌颂统一，它第一个在思想上确立了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各朝各代的前后连接上，《史记》第一次建立起了中国自黄帝以来朝廷的正宗统系，后代史家在处理分裂与统一关系时，即使是天下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也都注意探寻能够代表着统系的实际主宰力量，尽管各家认识上有分歧，但均关注统系的存在却是一样的。再次是实录原则，司马迁写通史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他是依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典籍文献、档案资料，综合亲身的实地考察采访，加以考证才写出来的。司马迁赞赏古代史家的“直书”精神，努力将它贯彻到通史中去。《史记》中尽管有些记事的材料有出入，或不一定准确，但总体来说除传说时代以外，它确是信史，这是毋庸置疑的。班固在史学观点上批评司马迁，但他也不能不颂扬《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①。由此，是否具有“实录”的精神，是评价后代史家著述价值的必备条件。最后是厚今原则。《史记》是通史，跨越时间很长，但它记述

^① 《汉书·司马迁传赞》。

的重点是近现代，尤其是当代。秦汉这段时间共 150 余年，在整个《史记》记事的三千年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十二本纪，秦汉占了七篇；十表，除前三表外，余七表全是秦汉；七十列传，自卷二十三、二十四邹阳、贾生以后全是记秦汉的，只有极少数篇章内容涉及秦汉以前，而其中从卷四十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以后又基本上是记汉武帝时期的，光汉武一代所记人物事迹就约有 20 篇。《史记》薄古厚今，尤其重在写当代史，既说明当时写史所具有的较为宽松的进步的时代气氛，同时也表明司马迁敢于指陈现实的巨大勇气。后代写史的条件越来越严酷，但《史记》所确定的厚今原则，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二）创设了纪传体史书体例

在《史记》以前有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禹本纪》《山海经》《穆天子传》《世本》《秦纪》《楚汉春秋》以及年纪谱牒等多种史书记述形式，但从体例上来看都不完整、规范，至《史记》才创制了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综合为一体的“纪传体”史书体例。

1. 本纪

刘知幾《史通》说“天子曰本纪，诸侯曰世家”，意思是说记载天子事迹的体裁称为本纪，记载诸侯事迹的体裁称为世家，这个说法只看到了《史记》运用本纪、世家体裁的表面，而没有深入了解司马迁创设的本意。司马迁自己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这就明确了写作本纪的主旨。就本纪而言，《史记》不只是记天子事迹，而是通过历史上帝王世系年代传承的记述体现历史的时间性，表示天下发展大势。《史记》十二本纪中，《五帝本纪》《秦本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是最有争议的，但正体现了司马迁的上述思想意图。《五帝本纪》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将黄帝作为中国历史大势的开创人物，并以禅让开始来体现一种德治模式；《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是一般形式的编年纪事，德盛德衰影响政治成败的记述非常明显。按正统的观点来说，周王朝以后就是秦王朝了，自然以《秦始皇本纪》来接续就可以了，但司马迁却在中间横插了一篇《秦本纪》。秦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个诸侯国，司马迁不

把它写入世家却写入本纪，是为了表示秦以武力统一天下的过程，正是由儒家德治转入法家力治的关键步骤，不记述这一步骤，天下大势演变的原貌显现不出来。中国历史秦代后是汉代，《秦始皇本纪》以后接续《高祖本纪》就可以了，但司马迁又列出一篇《项羽本纪》。项羽不入列传，不入世家，却列入本纪，是为了说明项羽以武力灭秦以后，自称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诸侯，直至楚汉相争失败，其事迹系于当时的天下大势，所以列他入本纪。项羽的最终失败，也说明残暴的武力统治均会短命而亡，不可久安，刘邦是个宽大长者而终于取胜，说明德力统治的又一次转化。古人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是说妇人不可以主政，但司马迁和这个看法相左，不立“惠帝本纪”而立《吕太后本纪》，是从实事求是出发，认为当时真正掌握国家大权的是吕太后，就可以将她写入本纪，勇敢地撇去了在统治权上区别男女的偏见。吕后继刘邦之后，继续执行休养生息政策，无为而治，使生产得到发展，民众逐渐富足起来，她之所行是以道家学术为先的德力结合以德为先的统治方案，又是天下大势发展的重要一环。经文帝、景帝，自流放任的结果导致社会矛盾尖锐起来，至武帝时内法外儒的公羊学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司马迁写的《今上本纪》当是这样一种天下大势思想的表述，然而这篇本纪是亡佚了，我们已不可窥其原貌。《史记》本纪是全书的一个总纲，体现这个“纲”的作用的，除给予重要历史事件确定相应的时间位置及表明它的背景以外，主要价值是实事求是地表现出了历史发展的天下大势，这是应该明确的。

2. 表

这种体裁具有纵横交错、简明扼要、众事纷繁、一目了然的特点。司马迁说：“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同，作十表。”它辅助本纪，也起着“纲”的作用，而重要的是十表的设置显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在结构形式上，十表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重在帝王世次，它以此为经。全表又分为两截，前半截以不居帝王位的世次为纬，后半截以鲁至曹十国世次为纬，总的内容是“观百世之本支”。《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地为主，故年经（月表以月为经）而国纬，总的内容是“观天下之大势”，因此这四表在年

代显示上成为十表的骨干部分，贯穿着全史。《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下四年表以时为主，故国经而年纬，具见汉初六朝百有余年侯家的盛衰始末，并见惠景间的四朝事势和建元以后诛伐四夷的情况，总的内容是“观一时之得失”。《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记为主，年经而职纬，也就是首列纪年为经，次四格分列大事记、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旁行为纬，观其事可察人君治忽之机，可定人臣贤不肖之分，总的内容是“观君臣之职分”。其实观百世之本支，观一时之得失，观君臣之职分，也是从不同侧面考察政治事势，所以，表所包含的内容，就是以不同形式，结合具体的事态发展，来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天下大势。

3. 书

此种体裁，《汉书》改称为“志”，由于它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后代演变而为典制体，而其创始之源当出自《史记》。司马迁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史记》八书，记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司马迁把礼乐摆在前面，可见他非常重视礼乐制度在统治中的作用，实是显示了先秦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律，本应指音律，但《史记》依司马迁自己的说法主要是记军事制度。这前三篇均已遗佚，今之所存学者多论定为补篇，是以难见其原貌。历，是记历法的，今之所见可能有后人的窜乱；可能由于看法上的分歧，司马迁没有记述《太初历》的制订过程和具体内容，故使人至今不能通晓它的真貌，也是一个缺憾。天官，是记天象与五行星占的，其中有些迷信思想，但主要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司马迁是当时有名的天文学家，此篇在科学史上有重要价值。封禅，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大事，它可以神化皇权，不能不记，但此篇对汉武帝极具讽谏意义。河渠，记兴修水利，是农业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平准，以汉武帝时期的均输平准取名，重点是讲当时的财政策略。八篇中礼、乐、律、封禅属政治领域，历、天官、河渠属自然科学，平准属财政经济。由于草创且有缺失，八书内容不如后来《汉书》十志那么完备、全面。其中天官、河渠、平准是《史记》中的精彩篇章。

4. 世家

这是一种较为独特的体裁，后来的正史中很少有这种体裁，它的产生